

●青年史苑

容闳与曾国藩的合作动因论析

闵海霖

(铜陵学院 安徽铜陵 244000)

摘要：本文从史学、社会心理学和沟通技巧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容闳、曾国藩合作的内部动因，它来自理念相似、尊重相得、互补相依与互通双赢。

关键词：容闳；曾国藩；合作；内部动因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5-0054-06

需要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动因，它按其对象，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1863—1872年间容闳、曾国藩合作办了引进西方机器、内办兵工学校、外派留学生三件有益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创性实事。容、曾从事此类活动的动因亦是需要。本文以史实为基础，析其合作活动的内部动因和互通双赢技巧。

一、理念有似同乃其合作的首要内部精神动因

容、曾的理念各是什么？

容闳在《自传》中写道：“盖当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予胸中矣……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富强文明之境。”^{[1](p.62)}1870年他又在天津强调：“使予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之文明学术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为少年新中国。”^{[1](p.124)}简而言之，其理念是追求“教育救国”、“西学东渐”，使衰老的封建主义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新中国。

1860年曾国藩奏称：“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p.1272)}186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为下手工夫，使彼之长，我皆有之。”^{[3](p.748)}1863年他奏称：“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4](p.128)}他告诫其弟“君子

之立志也……有内圣外王之业”。^{[5](p.23)}简而言之，其理念是追求“师长夺恃”、“中体西用”以强化封建主义的大清帝国。

容、曾的理念异同如何？

首先看似同方面：其一，爱祖国。容闳虽对大清王朝抱批判态度，但在甲午战前尚无变更政权的思想。他于1863年投入曾营后，多次接受清政府官职，成为统治集团一员。他对祖国的爱，集中表现在忧国忧民、维护民族主权。“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每一念及辄为殃殃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之痛苦与压制。”^{[1](p.61)}归国后，他目睹“寄居租界内之中国人，每受外人之无理待遇，引忍退让，致养成……外人之骄恣喧宾夺主”。^{[1](p.77)}究其病根在：“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1](p.61)}他念及国人因缺失教育而麻木愚弱，“西学东渐”的信念推动他先后提出《七条建议》和《四项条陈》。1912年他于弥留之际仍嘱两个儿子“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成人才，愿回报祖国”。^{[6](p.81)}

曾国藩原名子城，后来改名国藩，志在要做一名屏藩大清的中兴名臣。他对祖国的爱既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体又有维护民族主权的思想。蒿目时艰，他“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7](p.669)}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逆夷犯顺，凭陵郊甸，北望宸极，神魂震越。”^{[8](p.1618)}并

作者简介：闵海霖(1975—)，男，安徽桐城人，铜陵学院讲师，硕士。

表示：“君父之难，义无反顾，愿率师北上，以靖夷氛”。^{[8](p.1610)}这种“忧悸”、“神魂震越”都是来自对大清王朝安全缺失的一种紧张心理。它是驱使曾国藩追求坚船利炮的精神动因。

其二，御外侮。容闳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假手于客卿，中国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1](p.169)}“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欧洲各强国，甚且倡瓜分中国之议”^{[1](p.77)}他责问当局：“在同美国和其它国家协商条约中，竟让美国人蒲安臣充当中国首席代表，那怎么会是合适的呢？”^{[1](p.169)}“教育救国”是他的信念，他认为“盖人必受教育，然后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1](p.77)}他期望通过教育，培育国人近代素质，增强御侮实力。

1842年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英夷……此辈丧尽天良，不知何日恶贯满盈，始得聚而歼灭。”^{[5](p.13)}他多次上奏，反对“借师助剿”，指出：“自古外夷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2](p.127)}“借师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9](p.20)}主张“中华之难，中华当之”。^{[10](p.2390)}1863年曾又强调“李泰国七船……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11](p.3949)}他建议立即将由中国出银购买，英国控制的阿思本舰队解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反对，“李泰国先生失掉了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本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12](p.208)}1865年他在复友人信中强调：“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制造，造成此物则足以定中国人心，隐以折彼异族之谋”。^{[13](p.5464)}由于侵略者“丧尽天良”、“后患不测”使曾国藩深感国家主权受损，安全缺失，急需“制造枪炮”，“赶紧制造”轮船，以便“聚而歼灭”入侵之敌，“隐以折彼异族之谋”。

其三，学西方。容闳长期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年少即在澳门教士学校读书，19岁赴美留学，22岁考入耶鲁大学。他是当时最早的接受西方正规教育而又少受儒学传统束缚的中国人之一。“化学实验在玻璃仪器内显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微积分可以启发对合理化的思考和追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史也足以使他痛切地感到专制制度违反人性和缺乏道德基础。”^{[1](p.18)}他从中西社会文化的比较中看到封建落后的中国应当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认为“西方教育”是“西方文明的表征”，^{[1](p.39)}故学西方的重点当在教育救国。1863年容向曾提出先立一机

器“母厂”^{[1](p.112)}的建议，并将从美国所购之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14](p.5505)}沪局由此开始实现从手工操作向大机器生产转变的结构性飞跃。1872年容、曾合力使中国近代首批官费留学生终于成行。容闳主张“学生年龄规定在12岁以上，15岁以下”，^{[1](p.127)}他们“到外国留学，不能只学各科常识和外国语言，那样做，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为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1](p.18)}他赞赏“久经专制，习于服从的中国留学生既离故国来此，终日饱食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之健身运动，跳踯与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1](p.137)}他强调招生年龄小、学习年限长、意在尽早摆脱封建影响，系统接受西方教育，鼓励青年思想解放，追求自由平等，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学习。不难看出，容闳实际上已有一个带有西方色彩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人才目标。

容闳称曾国藩是中国“旧教育之特产人物”，^{[1](p.108)}其“特”在他既是一个捍卫纲常名教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兼采各家的经世致用者。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使他从中外武器的比较中看到“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15](p.622)}“湘潭、岳州两次大捷实赖洋炮之力”。^{[7](p.161)}他亲身接触过一些西方物质文明的载体，“观修造机器……造洋火铜炮，锯大木如切豆腐，尤为神奇。”^{[16](p.1419)}通过望远镜他“看半里之物，尤在门户咫尺间”。^{[17](p.679)}科学能驱走陈腐的观念，这对曾也不例外。曾国藩投身洋务运动的时限在1861—1872年，他第一个提出“师夷智以制炮造船”的思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此后由该厂制成中国第一艘木质轮船；他接受容闳的建议，第一次派员出洋购买成批西式机器；他和李鸿章共同筹办的沪局用机器造出中国第一艘钢质轮船；他接受容闳的建议推动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成行。曾国藩无愧是洋务运动自强阶段学西方的领军人物。

接着看两者相异方面：容闳和曾国藩的最大歧异在理念的终极目标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

容的教育计划在致力于培养近代知识分子。曾虽同意派遣留学生，然意在培养为封建政权服务的洋务人才，本领要新的，思想要旧的。他坚持在学习内容中塞进“兼学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18](p.167)}

1867年容提出中国第一个商办轮船公司方案，主张自购轮船，独立经营，保权争利，打破外资壑

断。然而,曾关心的不是发展民族资本并以“于商不便于官亦殊不便”^{[19](p.639)}为由,对此加以拒绝。

理想和信念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用什么样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前途,择定人生方向的问题。容、曾二者的理念不完全似同,亦不完全相异,既有联系亦有区别,起点和终点不同,中途有段同路。爱祖国、御外侮、学西方是二者的共识。曾国藩理念的起点是造船制炮,终极目标是达到大清帝国的自强。容闳理念的起点是其教育方案,终极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富强的新中国。两者求同存异,在摩擦中互动,然而,离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两者理念都难实现。

共同信念推动共同努力

十九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容、曾两个炎黄子孙,为解决民族危机的现实问题,可以凝聚共识。“物以群分,人以类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类似的东西往往被作为一体而被感知,一般来说我们是喜欢自己的,所以就会对被归纳为与自己同一的人怀有好感”。^{[20](p.218)}爱祖国、御外侮,学西方是容、曾的共同信念,“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信念也是内部动因,共同信念推动的共同努力就是凝聚力,这里的关键是“共同”二字。

利益是关系的纽带,利益一致是激发人们产生凝聚意识的基础,共同利益是形成共同信念的前提。容、曾二者的共同利益就是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1860年曾国藩提出:“师夷智……尤可期永远之利。”“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遂檄委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而塞银钱出海之漏卮”。^{[21](p.23)}1871年曾奏称:“借洋人之机器,开中国之铁煤……铁煤不须购自外洋,则诸事绰绰有余裕矣。”^{[22](p.7189)}曾所愤的是洋人独揽专利,所争的是为民族“塞漏”、“省费”,做到“煤铁自给”,力争“永远之利”。容闳关切“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化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1](p.169)}他建议“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口之贱,将来自造机器,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1](p.111)}倡“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以期将来不必需要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1](p.120)}他在《条陈四则》中提出“政府宜设法开采矿山,以尽地利”,^{[1](p.122)}这一切无不至关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共同利益形成共同合力。

二、尊重和归属有所得, 乃其合作的重要内部精神动因

人是社会的人,在人际交往中还有尊重和归属的需要。首先谈尊重需要。其一自尊,“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自尊离不开自强,应有功绩可尊。容、曾各以其智力和权力在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中有发轫开创之功,前文已有所述。自尊离不开自主,应有独立人格可尊。1850年,容闳22岁“就以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同那些慈善基金会一刀两断”,^{[1](p.163)}“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1](p.58)}他断定宗教不能救中国,这就是他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1857年在沪,他投书英籍总税务司质问:“予与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维护主权、追求平等的信念引发他愤而辞职。^{[1](p.73)}当年他还在上海怒打西洋无赖,拒当买办,指出“买办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1](p.79)}自尊离不开自律,“廉生威,公生明。”1856年,容闳任职海关,因“此间有一恶习,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1](p.73)}他不屑与伍。

曾国藩在廉洁自律方面和他同时代的封建官僚相比,算是不可多得。容闳在《自传》里写道:“曾文正虽‘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鸿章)不可同日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之,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以为后人之模范。’”^{[1](p.107)}

其二他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尊重总是双向的,“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另一个人,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这另一个人是否也喜欢他”。^{[20](p.217)}

容闳仰慕曾国藩的历史地位、社会贡献、人格才华。容对曾怀有高山景行之情,他肯定“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为清代之第一流人物”,^{[1](pp.107-108)}“一生政绩,忠心人格,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1](p.128)}“文正为人具有一种无形之磁力吸引吾人,使心悦诚服”。^{[1](p.150)}他是一位“头脑中很有见地,懂得中国在争取国际地位中的许多弱点和起因”,^{[1](p.168)}“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1](p.121)}

容、曾关系不是曾令容行,而是平等协商。“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礼重,乐与交游。”^{[1](p.110)}1863年容闳提出设机器“母厂”之议与曾

之本意相悖,曾听后说:“此事予不甚了了”承认自己对办近代企业是外行,要他与徐寿、华蘅芳等专家们“详细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1](p.112)}1870年清廷批准曾派遣留学生之奏,他立即邀请容“商此事之进行”,^{[1](p.126)}实际上有关招收留学生的对象、学额、批次、年龄、经费、考试科目、毕业分配、生活管理等事项无不由二人平等协商而定。

再谈归属需要。任何人都是在与他人交往中生活的,归属需要也是交往需要的一种表现。容闳加入美国国籍,娶美籍妻子,成为美国公民,然而,“他从头到脚,身上每有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1](p.173)}1854年他学成归国,“竟似一异域来客,然眷念故土同胞之热情固未曾或减”。^{[1](p.12)}“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记了……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与照顾,可以说没有任何立足之地。”^{[1](p.165)}实际上容闳已成为身处中西文化交界之处,却远离某一文化中心的边缘人。

容闳既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然个人力小,合群动因驱使他,“设法把方案提到某些有权势而又关心公益的人面前去”,^{[1](p.166)}“多识商学上流人物,推广交流以遂予之第一目的”。^{[1](p.78)}容的留学生出身与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入仕的权力结构不相适应,回国八年,曲高和寡、处处碰壁,未及一年三迁其业,八年之内四次失业,贩茶于“泾县夜中遇险事,过后思量,犹存心悸……神经已受非常之震动。”^{[1](p.104)}“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正值斯时,曾国藩委人数月之内三致其书,“谓总督有一极重要之事欲委予专任,故劝驾速往”,“总督欲予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1](p.106)}与此同时,李善兰等人“此时亦在曾文正幕府中,固极力揄扬予于文正。谓曾受美国教育,1875年赖予力捐得巨款赈饥,且谓其人抱负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富强”。^{[1](p.106)}“予来此约两星期,在大营中与旧友四人同居,长日晤谈,颇不寂寞”,^{[1](p.110)}他从侧面得知,“总督闻予历史后,此六阅月内殆无日不思见予一面。”^{[1](p.108)}当年他就被任命为出洋委员,授五品军功衔,成为清政府的官员。容闳从此为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所接纳并在其中获得一定地位,博得上流社会成员的赞誉。这就满足了他的归属需要,其社会地位及存在价值得到承认。良禽择木而栖,边缘人有了依归,增强了他施展才能的积极性。

三、互补成相依,乃其合作的特殊内部动因

互补性是指异质性成员在某些方面的相互补充。相互满足对方需要是构建互补关系的关键。

容、曾双方各有所长,容闳是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曾看准容的优长是,“该员在花旗居住甚久,而志趣深远……熟悉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18](p.157)}他所办的事是“今日不可少之务,其人即为中国可造之才”。^{[12](p.264)}客观地讲,容之短在缺乏财富和地位等社会资源,在旧中国没有权力和财力的支持,一介书生万事难办。他只能以知识精英的身份,提出建策去影响大政之走向。寻求政治靠山,是他在实现“西学东进”的唯一途径。

曾国藩位极人臣,“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1](p.107)}“怀才之士,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1](p.110)}于曾营。客观地讲,他办洋务的短处在不懂外语、不悉洋情,不懂自然科学。不难看出容之所长正乃曾之所短,曾之所长又恰为容之所短。容的最大优势为精通外语、久处泰西、人脉广泛,其沟通中西交往的能力在当时的中国无人可及。曾的最大优势在拥有军队、政权、土地、钱财,在当时的“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二者提供彼此在其各自活动领域的核心能力,进行合作。此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权力与智力的强强联合。

容、曾双方取长补短,智力代表容闳提出购制器之器,立兵工学校,选派留学生等灼见,并为此“备历艰辛”,对合作事业起引领性和支撑性作用。权力代表曾国藩“发委任状,命予购买机器”,“授五品军功”“又有公文二通命予持以领款。”^{[1](p.112,113)}文正“极为赞许”“立一兵工学校”,专折为容“保五品实官”,联衔奏请派遣留学生。他反驳“以购器替代学技”之说,指出:“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邃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22](p.7332)}针对“无须远涉重洋”之说他反驳称:“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22](p.7332)}曾国藩充当了政治靠山,扼握盾牌的角色。“异质性成员……彼此在某个或若干方面能取长补短、互相补充时,也会增加成员间感情和密切关系,增强凝聚力。”^{[20](p.333)}

四、互通获双赢,乃其合作的有效内部助因

其一,先期进行非正式晤谈,了解彼此需要。“沟通、事实上就应当如此——彼此意在了解

双方所需,并共同拟定解决方案”。^{[23](p.16)}成功的沟通要求事先了解对方情况,除了向对方探求信息外,最好的方式是在正式晤谈前,进行非正式晤谈。因为这种场合压力较轻,便于了解彼此所关心的事项。1863年容闳第二次到安庆,次日曾国藩就接见了。曾凭其经验,巧妙地问及“若居外国几年何矣?”“若愿乐就军官之职否?”^{[1](p.110)}这第一问是曾要进一步了解容沟通中西的能力,第二问是了解容对他的需要。他把双方的需要搞清楚,便说上几句次要的客套话,诸如“予年若几何?曾否授室?”多少也和他将酌定的安排方案沾边,便举茶送客。两星期后,容闳和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张斯桂旧友共五人,有一次自由谈,随意谈到曾需要“设一西式机器厂,议已成熟,惟厂之性质若何,尚未决定耳”^{[1](p.108)}老友们各抒己见,容闳也畅所欲言,他的观点很快成为五人共识。这实际是一次偶然却又十分成功的先期非正式晤谈。通过这次自由谈,容闳知道曾国藩需要的底线是“设一西式机器厂”,可讨论的范围是“惟厂之性质若何尚未决定耳。”他在此范围内拟定出兼顾双方的新方案,即设立机器“母厂”。新的方案既满足了曾最迫切的需要,也符合容爱祖国、御外侮的信念。

其二、伺机而行——抓住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要。

机遇的本质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容闳强调“办事必俟机会,机会苟至中流自在,否则枉费推移……然时机者,要亦人力创造也”。^{[1](p.123)}1861年以安庆内军械所的创办为洋务运动的发端,容闳立即敏锐地觉察出这个对中国社会有重大而持久需求的社会机遇。次年他便主动到曾国藩大营沟通。当年赵烈文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记载,1863年5月14日曾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提及“容春甫上年曾来安庆,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

以招智巧洋人来为我用”。^{[24](p.3669)}曾果断抓住这位罕异之才。容闳也深感“若再因循不往,必致坐失事机”,^{[1](p.107)}及时抓住这个既是时代也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机遇,应召来皖。事实上,他也正由此而有了成功的据点。

1868年曾来沪局视察,观运行之机,“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于厂旁立兵工学校。”^{[1](p.120)}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心境良好的情况下,往往表现和气热情、宽容、耐心,容抓住此良机。1870年曾国藩等处理“天津教案”,然而谈判结果却使中国蒙受极大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结果,而引为实行教育计划之机会”。^{[1](p.124)}容“全力以赴重申他的论点,以眼前案件为实例,加强论据,并恳请坚持此事,刻不容缓,这回他的游说奏效了。”^{[1](pp.171-172)}容闳在这里抓住洋务派办外交失败,急需外交、科技等方面人才的社会机遇,以天津教案为契机,化弊为利,促其教育计划之实现。

其三故作退一步以期取得最大需要

1863年容、曾在湘军大营正式晤谈。曾开门见山指出:“若以为近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当从何着手?”^{[1](p.111)}其实二人对此早就胸有成竹,然皆含而不露。容“为恰合总督之意见”^{[1](p.112)}乃将教育计划束之高阁。与此同时他又建议“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由此可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它种种有机械之物”。^{[1](p.111)}容闳的主张既不悖曾国藩的“制造枪炮”的需要,又满足了自己“当有机器制造机器”更长远的需要。此后成功像登梯一样,他步步实现其内办兵工学校、外派留学生等更高的需求。“成功沟通的第一个构成条件便是希望对方能成功”。^{[23](p.17)}容交往经验丰富,沟通技巧灵活务实,沟通的结果,双方都是赢家,都乐于遵守共同方案,友善关系可长久维持。

参考文献:

- [1]容闳.西学东渐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C].长沙:岳麓书社,1985.
- [2]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3]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17)[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4]张锦贵.试论中体西用[J].江海学刊,1989(6).
- [5]李翰章.曾国藩家书·家训[Z].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
- [6]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7]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1)[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8]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2)[M].长沙:岳麓书社,1994.

(下转第13页)

- [12] Степун Ф. Бывшее и несбывшееся. СПб., 2000. С. 621 – 622. (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2003 г. № 1.)
- [13] АПРФ. Ф.3. Оп.58. Д.175. Л.93. (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2003 г. № 1.)
- [14] АПР Ф. Ф.3. Оп.58. Д.175. Л.4. (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2003 г. № 1.)
- [15] Степун Ф. 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Очерк П. Соч. М., 2000. С.224. (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2003 г. № 1.)
- [16]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
- [17] Анеков Ю. П. Дневникмоихвстреч. Цикллекций. М.1991. Т.2. С.270. (引自 Дра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революция.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Москва. 2002. С.389.)
- [18]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M].刘文飞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
- [19] Известия. 1922. 30 августа.

(上接第58页)

- [9]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15)[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0]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4)[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1]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6)[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2] 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书信稿[Z].中华书局,1959.
- [13]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7)[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4]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9)[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5]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1)[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6]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8)[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7]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16)[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8]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19]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13)[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20] 全国十三所高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21]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22]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12)[M].长沙:岳麓书社,1994.
- [23] 汤姆·安纳斯塔西.互蒙其利的性格沟通法[M].张彤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
- [24]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卷25)[M].长沙:岳麓书社,1994.